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 戴知贤
- 河南人民出版社



92690

K77
30

40 年国是反思丛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 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 戴知贤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21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戴智贤

责任编辑 汪琼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8.5印张 165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870—26870册

ISBN7—215—00866—5 / Z·40

定价: 3.60元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且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笔直的。40年来，我们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积重难返的岁月，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中国40年历史舞台上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为整个人类历史所少见。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认真反思40年的历史，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财富的效能，必将对我

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40年国是反思丛书》即为此而尽力。

本丛书将着意展现共和国40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认某些历史事实是痛苦的。但唯其痛苦，才能使我们民族久已麻痹的那部分神经不再麻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牵扯到众多的死人和活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判明某些人的英明和某些人的愚蠢，或者某些人的高尚和某些人的卑鄙，而着眼于我们所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丛书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的。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40年历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那些“荒唐岁月”或“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

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40年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

小 引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62年至1966年的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本书打算对当时思想文化方面“过火的政治批判”，作一些历史的回顾，看一看这条“导火线”是怎样形成和怎样引爆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原因。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只想说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这场大动乱之所以称为“文化大革命”，就因为它的“导火线”是从文化思想问题上引发的。这场大动乱使我们的国家、民

族和人民遭受极大苦难，我们子子孙孙要永远记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研究一下这场大动乱的“导火线”，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8年“大跃进”失误，我国国民经济陷于困境。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迅速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三年的调整，到1966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在比较协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正如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在1962年8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认为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国内的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向着我们进行猖狂进攻。他作出这个估计，有当时现实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一向十分警惕帝国主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帝国主义的政治决策者们确实把改变社会主义中国使之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的和平演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对中国施加压力，更加深了他这种思想认识。联系到国内，由于“大跃进”失误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活动活跃起来；党内党外群众对中央领导决策失误有所不满和责难；又由于在调整工作中，党中央部分领导人曾采取某些比较灵活的政策和措施——如企业自负盈亏、农村开放集市贸易、个别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等，即对旧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一方面为了“应急”——战胜眼前经济困难，一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摸索新路子。毛泽东把这些现象都看成是阶级斗争，从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阶级斗争十分严重，要全党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十中全会以后，从1963年起，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部分精力抓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继续进行“反修”斗争，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他认为“四清”运动，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对于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状况，毛泽东的估计更为严重。他认为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有些文艺刊物尽是牛鬼蛇神；中央文艺团体至今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教育大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阴魂未散。总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迎头

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①。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出于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目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是他把许多并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现象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对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研究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正是要从历史的曲折中吸取教训。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目 录

小引.....	1
一 骤雨初歇.....	1
文化思想领域的“左”旋风.....	1
文化政策的调整.....	8
反对“五子登科”.....	14
尊重艺术规律.....	22
摘掉“白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28
短暂的复苏.....	38
二 红色信号.....	43
毛泽东的告诫.....	43
阶级斗争的可怕图景.....	49
“大写十三年”.....	55
“两个批示”.....	63
康生、江青的出台.....	69
三 艺苑奇冤.....	75
诬陷小说《刘志丹》.....	75
《李慧娘》和鬼魂戏.....	79
田汉和《谢瑶环》.....	87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及其他·····	95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105
	风摧棒打，百花寥落·····	115
四	哲学“罪案” ·····	121
	杨献珍怒斥主观唯心论·····	121
	“合二而一”的由来·····	129
	康生玩弄阴谋·····	135
	“思想罪犯”知多少？·····	140
	冯定的两本书·····	146
五	经史何辜？ ·····	153
	刚直不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153
	是非是怎样被颠倒的？·····	157
	戚本禹的发迹·····	163
	两次“史学革命”·····	171
	翦伯赞被置于死地·····	178
六	“教育革命” ·····	191
	两个“基本估计”·····	191
	“读书越多就越蠢”·····	196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	203
	两种教育制度·····	207
七	“文革”前奏 ·····	218
	批判《海瑞罢官》，陷害吴晗·····	218
	撒网“捕鱼”和攻击“要害”·····	225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炮制·····	231

“文革”启幕的紧锣密鼓.....	238
结束语——泛论“大批判”.....	246

一 骤雨初歇

文化思想领域的“左”旋风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个教训没有得到正确的总结，反而被宣称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反右以后，党内“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当时，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这个口号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左”倾情绪支配下，所谓“破除迷信”，实际上是宣传对专家、名家、行家的不尊重，轻视文化科学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当时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对科学家也不要迷信，对其科学要半信半疑”；“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等等。破除迷信变成了不相信科学。所谓“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主观幻想。报刊上批判“条件论”，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法则的制约，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思想上有钢就有钢，思想上有粮就有粮”等主观唯心主义的荒唐口号。

“大跃进”年代有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红专辩论”，把一些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在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拔”出来。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说，要彻底批判“条件论”，要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所谓“彻底批判”、“统统拔掉”，实际上是封住科学家的嘴，使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不敢再发言。1962年3月，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讲话，批判了1958年的这种错误做法，他说：

“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间，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一亩地，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他们（指科学家——引者）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的，但是不敢讲。他们说‘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听听这些话，也许我们少走弯路。”^①

对“大跃进”的浪潮反映最灵敏的是文学艺术，其中又以所谓“新民歌”风靡一时。当时有个口号叫“人人作诗，

^①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人人画画”，全国城乡出现了“诗画满墙”的情景。那些诗和画都是极度夸张的，什么“稻粒赛玉米，黄豆象地瓜，花生象山芋，山芋赶南瓜”；什么“深耕细作产量高，一颗玉米穿云霄；顺着梯子爬上去，半月才到玉米腰”；什么“树皮变棉花，稻草纺成纱；不用一亩田，造棉百万担”等等。这些诗歌数量之多，无法统计。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文化艺术事业》中说：“试看那气吞河岳，壮志凌云的亿万首民歌，有哪个象牙之塔里的‘专家’们能写出的呢？”郭沫若、周扬经过精选主编出版了一本《红旗歌谣》，可谓“新民歌选粹”。1958年9、10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有的地方大搞所谓赛诗会，摆赛诗擂台，进行浮夸比赛。许多诗歌互相模仿，一味堆砌豪言壮语，歌颂当时并不存在、甚至将来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间天堂”。当时把新民歌称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实际上是以幻想代替现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它是“大跃进”的产物，又反过来为“大跃进”火上浇油。

由于“大跃进”形势的促使和大规模群众文艺运动的影响，1958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跃进计划，要专业作家们多写、快写，“跃进，大跃进”，“放文艺卫星”，迫使作家制定无法实现的创作计划，提出过高的创作指标，不适当地强调集体创作，强调配合中心任务（名为“反映现实生活”），强迫作家去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于是出现了一批歌颂“大跃进”的公式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

1958年还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大批判。《文艺报》第1期在《致读者》中，把“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着重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列为文艺战线的中心任务。这是1957年批判“右派”思想的继续，即把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文艺理论和作品继续进行“深入批判”。接着，《文艺报》第2期开辟了“再批判”专栏，批判丁玲、王实味、艾青、萧军、罗峰等人40年代在延安写的几篇杂文和小说。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文艺报》编者按语，说这些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搞“再批判”的目的，一方面为这几位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找出“思想反动”的历史根子；另一方面，借当年在延安因为“暴露黑暗”受到批判的历史，来说明今天那些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家和作品被当作敌人和毒草来批判是理所当然的。

不仅在文艺界，在哲学、经济、历史、新闻、法学、美学等方面，也开展了对“修正主义思想”——即那些被划为“右派”人物的言论——的继续批判。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党中央为纠正“共产风”问题作了许多努力。经济建设方面纠正“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新建》杂志1959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在《红旗》杂志第10期上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他指出“科学大跃进”以来，史学界有一种主张，